

# 隐性解构与数字重塑：数智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

丁彦<sup>a</sup>, 柳博<sup>b</sup>, 邹晴<sup>a</sup>

(湖南农业大学 a.教育学院; b.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数智时代的来临改变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生态, 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被隐性解构的新样态, 并由此衍生出新的风险。具体而言, 数字化趋势使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环境生态面临隐性解构, 意识形态内生机制被隐性渗透, 意识形态主体认知出现数字迭代鸿沟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教育范式数字化脱节、意识形态监管的数字化治理系统性缺失以及意识形态外部环境数字化博弈加剧。因此,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需要适应数智时代的新形势, 从增强数字技术治理能力、创新教育教学形式、强化制度保障三个维度进行数字化重塑, 以化解数智时代意识形态新风险。

**关键词:** 意识形态风险; 隐性解构; 数字重塑; 数智时代; 高校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6)05-0011-08

## Implicit deconstruction and digital reconstruction: Preventing ideological risk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DING Yan<sup>a</sup>, LIU Bo<sup>b</sup>, ZOU Qing<sup>a</sup>

(a.College of Education; b.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has transform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ideological work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giving rise to new implicit deconstruction patterns in the ideological sphere, which further derive new ideological risks. Specifically, the digital trend brings three challenges to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mplicit deconstruction of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covert infiltration of the endogenous ideological mechanism, and a digital cognitive iteration gap among ideological subjects. These issues mainly stem from the digital disconnectio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paradigms, the systematic deficiency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ideological supervision, and the intensified digital game in the external ideological environment. Accordingly,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should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and carry out digital reconstruc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strengthening digital technology governance, innovati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orms, and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so as to defuse new ideological risk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Keywords:** ideological risks; implicit deconstruction, digital reshaping;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网络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数字技术的出现重塑了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生态, 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 面临着新的风险和挑战。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深

度嵌入, 使网络意识形态的样态呈现与传播逻辑在技术运作中被隐性重构, 传统的管控方式与教育模式面临结构性挑战, 推动高校意识形态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当务之急。

近年来学界对数智时代高校意识形态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对数智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出现新转向的形势分析。随着数智时代来临, 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和主阵地<sup>[1]</sup>, 人工智能拓展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新范式<sup>[2]</sup>, 数字化重塑了意识形态信息传播的路径、受众的认知结

收稿日期: 2026-03-19

基金项目: 湖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课题(24YBM32)

作者简介: 丁彦(1981—), 男, 湖南常德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构和舆情生成机制<sup>[3]</sup>。二是数智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面临新挑战的原因分析。新技术条件下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空前激烈<sup>[4]</sup>，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认知操控”“信息茧房”“算法黑箱”的挑战<sup>[5]</sup>，外源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交织<sup>[6]</sup>，技术失控、内容失真、把关失灵<sup>[7]</sup>，导致意识形态主体功能性式微、网络信息化受损、治理链接度消解<sup>[8]</sup>，不断削弱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话语权威。三是应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对策建议。学者们从理论阐释、价值引领、制度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审视<sup>[9]</sup>，构建了理论引领主体模型、制度维护客体模型、技术赋能介体模型的实践理路，提出要强化理论建构、阵地建设、法治保障、技术赋能、协同治理<sup>[10]</sup>，构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运行机制，建立健全高校意识形态风险协同治理机制，打造风险防范共同体<sup>[11]</sup>。

综上，学界已充分认识到数智时代对高校意识形态生态的深刻影响，并在风险样态、成因及对策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但仍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一是对风险新样态的剖析多停留于现象层面，未能深入揭示数字技术“隐性解构”的内在机理；二是对风险成因的探讨相对碎片化，缺乏对教育范式脱节、监管技术缺失、外部博弈加剧等结构性矛盾的系统整合；三是防范路径多呈分散的策略罗列，尚未形成从“隐性解构”到“数字重塑”的可操作性框架。为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解析数智技术对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隐性解构逻辑，并提出针对算法窄化、AI渗透、圈层固化、数字鸿沟等具体风险的数字化重塑路径，以期弥补现有研究在系统性、机理性和实践性层面的不足，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保驾护航。

## 二、数智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新样态

数智时代，以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数字化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当代大学生是数智时代的“原住民”和数字生活的潮流先锋，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对象。数字化和智能化打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生态，给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技术性的新范式和新转向。

### （一）意识形态教育面临隐性解构风险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

作。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深度嵌入，深刻重塑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赖以运行的技术环境与传播生态。新技术手段在拓展教育载体的同时，也对传统教育教学环境形成了隐性解构，使高校意识形态主阵地面临由外部环境变化所诱发的边缘性风险。

第一，意识形态教育面临“去中心化”的解构风险。数字技术瓦解了高校传统意识形态教育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传授格局。借助智能工具，大学生能够通过多元渠道自主获取信息，知识来源的去中心化与认知方式的智能化相互交织，使大学生认知体系的构建从“权威引导”走向“自主拼装”。这种认知模式“去中心化”的趋势，会导致知识权威性消解与价值判断简单化，各种碎片化信息、未经证实的网络观点会使大学生陷入认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陷阱，进而打破知识严谨性与泛娱乐化的区隔。各类非主流意识形态往往披着“知识分享”“前沿文化”等外衣，在媒体平台的日常传播中隐性蔓延，“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会解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权威性，削弱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话语权。

第二，意识形态教育面临“无边界化”的解构风险。数字技术打破了教育环境的时空区隔与壁垒，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教学方式重构了无边界的学习场域。数智化促进了教育资源共享与跨文化交流，在创新大学生教育环境的同时，这种无边界的教育环境也为各类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隐蔽通道。西方“普世价值”与各类亚文化思潮以“前沿文化”等话语为包装，借数字化渠道渗透到社交平台，隐匿于大学生的日常信息之中，持续消解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根基。

第三，意识形态教育面临“浅层化”的解构风险。智能化教学工具和信息化教学平台提升了高校师生信息的交互效率，拓宽了沟通渠道。同时，数字技术也削弱了师生互动产生的思想共鸣，数字交流的屏幕化特征无法替代直面沟通过程中肢体语言和眼神交流的情感与温度，教师难以通过细观察敏锐感知学生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与思想起伏。部分高校过度依赖技术平台开展思政工作，将课程思政的内容过于简单化，将意识形态内容标签化，忽视了思想引领的温度和情感深度。

## （二）意识形态内生机制面临技术性重塑

数字技术正以隐蔽方式重塑意识形态的传播格局。算法推荐与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使各类错误社会思潮借“算法黑箱”的未知性与不可控性实现精准渗透。技术赋能的背后，意识形态的内生机制正经历从传统引导向技术适配的深层转型。

第一，“算法化”窄化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传播方式。大数据对用户进行精准动态“画像”，通过算法推荐和数据分析，判断不同用户群体和个体的偏好和需求，进而定向推送其需要或感兴趣的信息。一方面，大数据“信息找人”可以实现精准推送，定向给大学生推送带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导向的内容，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渗透，使学生沉浸在所营造的信息环境中，不断强化错误的价值判断，诱导当代大学生认同错误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精准推送算法营造的“信息茧房”，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被蓄意“过滤”，导致大学生陷入错误的意识形态或非主流意识形态编织的“茧房”之中，接触主流信息的机会和空间被技术性封闭，导致辩证思维能力和理性思考能力逐渐被隐性解构。

第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糊了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边界。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强大的内容创作能力，能够快速生成高度逼真的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逐步渗透并重塑大学生的价值判断方式。AI生成的内容在形式上高度拟真，在逻辑上似是而非，极易混淆认知边界，模糊事实与虚构的区隔，形成以假乱真的认知干扰，严重弱化大学生对主流价值的辨识力与认同感。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依赖可能使部分大学生产生“技术拜物教”，导致逻辑思维被算法框架所束缚，其基本判断能力隐性衰减，从而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第三，“圈层化”固化了意识形态价值认知途径。网络圈层化使兴趣爱好相投或价值观念相近的人群趋于聚集，形成相对封闭的网络社群。在这些社群内部，社群成员之间频繁交流互动，同质信息在圈层内快速传播，信息传播范围被局限在特定的群体之中，最终形成圈层壁垒，固化价值认知的途径和渠道，进一步强化非主流的意识形态认知。“圈层化”的信息孤岛一旦形成，大学生往往沉浸于技术过滤后的偏好信息中，与圈层外信息接触越来越少<sup>[12]</sup>。圈层化现象使得社群成员更容易接触到自己

所偏好的信息，不断强化自身的固有认知，对不同观点产生排斥心理。在封闭的信息环境中，错误信息、极端思想也可能在圈层内不断发酵，进一步加剧群体之间的认知分歧。信息在圈层内部的封闭性传播，使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实现全域覆盖与有效触达，由此诱发意识形态风险。更为隐蔽的是，数字技术所固化的圈层壁垒，并非以直接对立的方式显现，而是通过隔绝对话、强化偏见、稀释共识，使意识形态安全在区隔中面临结构性消解。

## （三）意识形态主体认知出现数字迭代鸿沟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意识形态主体的价值认知面临技术迭代与代际更替的双重挤压。一方面，算法技术的快速演进与信息环境的急剧变化，在高校师生群体之间制造出显著的数字素养鸿沟与价值认知落差，代际间的意识形态认同矛盾日趋显现；另一方面，技术对信息筛选与观点生成的深度介入，削弱了主体的批判性思维与独立判断能力。二者叠加共振，使意识形态主体认知面临因代际差异而导致的认知脱节与认同断裂的新态势。

第一，主体价值认知矛盾凸显。数智时代的技术鸿沟，使高校师生之间的认知矛盾呈现出代际性冲突与迭代性差异相互交织的新特征。传统意识形态认知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主流价值的社会实践等渠道传播，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数字技术催生的数字鸿沟使师生之间价值认知的矛盾不可避免，大学生的价值认知深受数字化影响，尤其在大数据“算法推荐”的“精准投送”下，资本和技术加持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大学生的认知偏颇，诱发大学生逆反心理和对社会的错误认知，导致主体价值认知矛盾凸显。

第二，主体的批判性思维与能力弱化。算法通常以精准推荐和最优解为卖点，通过窄化信息来源，弱化认知主体的独立思考能力。算法推荐决策逐渐排除个人价值判断，用户群体最终陷入被动接受的认知状态。过度依赖算法导致大学生群体习惯接受算法过滤的定制化信息，逐渐丧失对复杂问题的逻辑思考能力与辩证分析能力。算法构建的“拟态环境”使部分大学生混淆现实与虚拟的价值边界，对网络谣言、虚假新闻缺乏甄别力，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停留在情绪宣泄而非理性批判之上。大量

迎合性、碎片化信息充斥大脑,以普遍性、严肃性、完整性为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难以穿透厚厚的“气泡”进入用户视野,用户也难以对其产生情感共鸣<sup>[13]</sup>。数字技术鸿沟进一步削弱了大学生对意识形态的基本判断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第三,主体认知的数字鸿沟加剧。作为数智时代的“原住民”,大学生群体的数字化生存已不再是一种技术选择,而是嵌入其日常认知与行为模式的基本生存方式。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大学生群体呈现出信息获取碎片化、生活方式数字化、思维方式网络化、价值判断多元化等特征。他们往往在短视频创作、人工智能工具应用、网络社交等方面展现出天然适应性,数字化和智能化深度融合导致了大学生的“数字沉迷”,影响了其认知方式的重塑、思维模式的转型及价值取向的形成。相反,高校教师作为教育主体,在数字化进程中呈现出一定滞后性。部分教师存在技术焦虑,在直播教学、虚拟仿真课堂、教育数据整合运用等环节能力不足。这就导致大学生通过技术渠道获取的碎片化信息与教师系统性知识传授形成认知错位,教师难以用大学生熟悉的数字语言解读主流价值,导致课堂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教师因缺乏对大学生网络亚文化的深度理解,在社交媒体互动中常被视为“数字边缘人”,难以通过数字空间的情感共鸣实现有效价值引领,从而削弱了意识形态教育的亲和力与说服力。

### 三、数智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缘由

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指引。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大学生群体日益活跃于互联网,高校意识形态治理也面临着多方面挑战,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教育范式数字化脱节、意识形态监管数字化技术治理系统性缺失以及意识形态外部环境数字化博弈加剧。

#### (一) 意识形态教育范式的数字化转型脱节

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正在重构知识传播的逻辑链与价值传递的时空场域,倒逼意识形态教育范式从现实场域向虚实结合转型。然而,当前的课程设

计、教学方法和评价机制与大学生群体的认知习惯、信息获取方式及价值建构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传统教学与数字场域分离、风险防控机制与跨场域治理需求脱节、教学评估体系与精准育人目标错位,最终导致意识形态引领效能逐渐减弱。

第一,意识形态教育场域的数字化转型滞后。数智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场域出现了新的转向,当下意识形态教育在教育内容、载体和方法等方面都未能适应数智时代转向,导致数字化转型脱节。首先是传统教育内容数字化转型脱节,理论阐释偏重文本灌输,缺乏对数字内容的创造性转化,进而导致代际之间的话语内容断层和话语体系脱钩。其次是教学载体数字化转型脱节,教学载体存在形式上数字化但内容上还是传统化的情况,不能有效满足大学生课堂互动和体验的需求,使其更容易被课堂教学之外的娱乐化载体吸引。最后是教学能力数字化转型脱节,部分教师数字素养有待提升,对网络舆情引导、在线教学平台管理、虚拟空间话语权等管控能力不足。

第二,意识形态风险联防联控治理存在数字壁垒。跨部门、跨场域治理共同体尚未形成。一是高校内部“数据孤岛”问题突出,学工、宣传、网信和保卫等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风险预警联动效率低。针对部分大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布不当言论引发的舆情事件,相关部门缺乏针对性干预措施,错失引导时机。二是校社合作存在“治理真空”,对校外平台和校园周边网络空间等意识形态监管存在盲区。三是家校协同育人机制滞后,家长对大学生思想动态掌握不足,导致风险防控出现家校断层的现象,难以形成家校联控的合力。

第三,意识形态教育效果难以量化评估。传统的评估方式难以量化数智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一是传统意识形态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滞后,缺乏对大学生在数字场景中的数据统计和量化评估。部分高校虽然采取了线上测试考查学生对网络意识形态的识别能力,但主要测试内容仍然是在是非判断层面,缺乏动态精准信息评估内容,无法准确获取大学生意识形态风险的实时评估结果。二是动态追踪机制缺位,导致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演变的长期数据积累严重不足,难以捕捉“反向认同”

等隐性风险的形成轨迹与演化规律,使意识形态风险的预警与干预缺乏数据支撑。三是技术工具更新受限,目前高校意识形态风险评估的数字工具尚不充分,尚未构建综合认知分析、情感评估、语义分析和网络舆情建模的智能评估系统,精准施策能力不足。

## (二) 意识形态监管的数字化技术治理系统性缺失

当前,新兴技术的迭代速度已明显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监管框架的管控能力,数字技术在赋能教育治理的同时,也因技术自身的隐蔽性、跨域性与快速迭代特征,使监管难度与潜在风险同步攀升。从技术架构来看,网络的去中心化特征消解了传统管控模式下信息枢纽的集中统摄能力,使意识形态风险的隐蔽追踪面临显著的技术瓶颈;从传播规律来看,算法驱动的信息推荐深刻重构了价值传导链条,使意识形态内容的传输从“泛在覆盖”转向“靶向投送”,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全域覆盖制造了结构性障碍;从主体关系上看,多元参与的利益诉求加剧了责任边界的模糊化,算法伦理审查制度亟待建立。

第一,技术隐蔽化致使追踪困难。随着区块链、加密通信等技术的普及,不良信息传播呈现去中心化的特征,境外势力通过匿名区块链平台发布美化历史虚无主义的图文,利用加密技术躲避常规网络监控,高校难以快速定位信息源头并阻断传播。除利用新兴技术使意识形态渗透手段隐蔽化之外,境外势力还利用AI生成技术制造虚假舆情,依托算法推荐进行定向传播、沉浸式渗透,隐性植入价值观念,甚至通过加密通信工具绕过常规监管,最终形成“算法黑箱”以逃避监管。

第二,算法推荐加剧认知窄化与数据泄露风险。开放性的数据收集与精准操控的算法应用能精准跟踪数据隐私,对个体的意识形态认知构成威胁。部分非法程序通过校园网登录端口、学习类APP等渠道,窃取大学生浏览记录、搜索记录和社交账号信息等数据,进而根据大学生的兴趣偏好有针对性地推送定制化内容,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渗透。同时,“信息茧房”和“回音壁效应”则进一步固化了大学生的认知偏见,削弱了其对多元价值的了解和辨析能力,而目前数据监管力度不足导致高校敏感数据存在泄露与滥用的风险。

第三,算法伦理审查缺失。部分校园使用的资讯平台、社交群组推荐算法存在“唯流量论”的倾向,校园论坛算法为追求活跃度,将调侃历史人物、歪曲经典理论的泛娱乐化内容和各种虚无主义的帖子置顶推荐,导致错误思潮在大学生群体中迅速传播。而平台缺乏对算法价值导向的前置性审查机制,技术开发者、平台运营者和内容传播者等责任主体权责划分不清晰,导致意识形态风险溯源困难。同时,高校数字技术治理能力滞后,缺乏跨学科的算法伦理评估机制与技术预警系统,致使高校在面对算法驱动的意识形态风险时,长期处于风险识别滞后的被动状态。

## (三) 意识形态外部环境的数字博弈形势加剧

当前,境外势力凭借技术差异与平台监督盲区,不断对高校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输出。部分境外势力借助隐蔽的网络平台和交流渠道,开展认知操纵和话语争夺,企图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力。境外平台借助技术与规则漏洞和监管盲区实施价值观软渗透,加剧了高校意识形态风险。

第一,境外社交平台管辖权冲突。部分境外社交平台利用数据本地化的规则漏洞和监管盲区,在高校用户中传播涉港、涉疆、涉台虚假信息及“颜色革命”动员内容,以“学术自由”“信息共享”为幌子,通过跨国在线课程、国际学术社区植入西方价值观。同时利用数字殖民手段,对高校师生进行文化输出,推崇西方学术评价体系,贬低我国自主知识体系。除此之外,还利用留学生群体在境外平台参与我国制度讨论与批判等话题,将相关观点转发至国内社交圈群,引发部分大学生跟风讨论,导致不良舆论扩散。

第二,文化软实力竞争不对等。西方势力利用影视剧、游戏、网红博主等载体进行隐蔽的价值观输出,形成“文化倾销”效应,加剧文化软实力竞争的数字化不对称性。一是借助媒体平台、游戏产业、虚拟偶像等文化产品隐性输出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借助数据叙事重构历史认知,利用选择性数据解读国际议题,用西方滤镜看待我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现实,不断削弱大学生文化认同。二是某些影视作品以数字民族主义为话语外衣,通过塑造个人英雄主义角色与暗喻现实议题,对我国历

史文化进行隐性虚无化处理。大学生在追剧消费中长期接受此类叙事浸染,其意识形态认知面临潜移默化的偏差风险。

第三,法律法规滞后导致追责困难。全球数字治理与追责体系落后于技术发展,数字治理落入国际博弈的“规则赤字”困境。跨境数据流动、网络主权、数字内容监管等领域缺乏统一的国际规则,导致对境外平台侵权行为的法律追责无据可依。加之西方国家利用长臂管辖,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管控失效与追责无据的双重风险。

#### 四、数智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路径

妥善处理和化解数智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对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应从增强数字技术治理、创新教育教学形式、强化制度保障三个维度着手,完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体系,实现意识形态工作的数字化重塑,为意识形态安全保驾护航。

##### (一) 增强数字技术治理,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

在数字化发展纵深推进的总体趋势下,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不仅拓宽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路径,同时也催生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多重风险。只有深入推进数字技术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才能切实掌控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将技术势能转化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效能,在守正创新中夯实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第一,制定并推行算法推荐审查制度。推动数字技术进一步为我所有、为我所用,是推动互联网从“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的题中应有之义<sup>[14]</sup>。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对算法推荐技术和内容的审查。一是建立技术与内容兼顾的双维度审查机制。一方面,从技术设计层面要求平台提供算法核心逻辑,接入算法透明度监测系统,设置意识形态安全过滤算法模块。另一方面,积极组建专家库,对新闻资讯、社交媒体、学习类APP的算法推荐内容进行定期抽检和动态评估。二是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按内容风险等级制定差异化审查标准,建立预警清单,将所审查的算法推荐内容对标定级,建立快速处理意识形态风险程序。三是强化平台主体责任

任。要求相关企业指定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员,将算法审查纳入平台安全评估审查体系,将违规行为纳入信用评价体系,主动规范用户网络行为。

第二,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准则。一是建立全链条监管框架。在研发阶段,将AI训练的数据严格备案,禁止使用含有错误价值观导向的内容。在应用阶段,强制要求生成内容显著标注“AI生成”标识,建立内容溯源机制,以使用户和审查机构能及时发现AI生成内容。在评估阶段,高校要加强监管,联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意识形态安全评估,定期发布《高校AI应用安全白皮书》,为学校师生提供应用参考和预警。二是构建伦理治理体系。成立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规范智能答题、虚拟助教等场景的内容输出边界,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伦理审查。三是研发安全可控技术。支持高校联合企业开发意识形态风险拦截模型,利用语言处理技术识别有害内容生成倾向,及时拦截删除AI生成产品中的虚假信息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内容,同时引导师生正确认识、合理运用和批判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及其产品。

第三,建立智能化风险监测机制。一是构建技术与人工的联合系统。一方面,部署全网舆情监测平台,整合大数据收集、情感分析、话题聚类等技术,实时监测论坛、短视频、直播等平台的敏感信息传播轨迹。成立由学校党委成员、党政部门负责人、二级党组织负责人、辅导员、思政课教师、学生骨干等组成的意识形态风险监测队伍。另一方面,组建专职网评员队伍,建立应急响应机制,针对AI生成谣言、历史虚无主义内容等开展定向溯源和精准驳斥。二是强化数据安全防护。建立高校意识形态数据安全库,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传播链路存证,对涉及意识形态安全的数字资源实行分级授权访问,加强对涉密信息的安全防护。三是开展风险预判预警。高校可以基于历史数据构建意识形态风险评估模型,定期发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关报告,提前识别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形成“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的闭环管控机制,推动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的智能化转型。

##### (二) 创新教育教学形式,提升高校意识形态传播主动性

当前,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场域,亟

须主动创新教育教学形式，增强意识形态传播的前瞻性、主导性与主动性。通过教育教学形式的创新，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教学各环节，引导大学生构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思想根基。

第一，打造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一是构建沉浸式教学场景。一方面，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还原重大历史事件场景，设计互动式剧情让大学生参与模拟决策，研发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到思政课堂中，营造沉浸式课堂氛围，使大学生身临其境般感受历史场域。另一方面，建设思政资源云平台，整合已有思政平台的功能，增加互动问答、虚拟打卡等轻量化学习模块，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二是通过线下课堂案例研讨、情景辩论等课堂形式与线上平台发布个性化学习任务相结合，形成“课前讨论—课中互动—课后延伸”的教学闭环。三是搭建数字交互平台，构建开放、常态化的师生互动模块，拓展情感联结渠道，以深度交流与情感共鸣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亲和力与实效性。四是建立科学的课堂效果评估体系，充分利用大学生学习行为大数据分析，帮助教师实时掌握大学生学习状态，动态优化课程内容和呈现形式。

第二，构建跨学科协同育人平台。一是打造数字技术与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相结合的交叉研究中心。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联合马克思主义、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学院，开展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意识形态安全等跨学科联动研究，为意识形态风险的研判和防范提供创新性路径参考。高校应系统挖掘各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教育资源，将价值引领有机嵌入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全过程，强化专业课程的隐性育人功能，推动思政课程显性引领与课程思政隐性浸润同向同行、协同发力<sup>[15]</sup>。二是开发融合课程。高校可以开设数智时代的文化自信、网络空间的国家安全等系列通识课，推动大数据分析、新媒体运营等技术类课程融入意识形态教育元素，让大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三是建立实践创新基地。高校可以与短视频平台、融媒体中心合作，组织大学生参与红色文化数字传播、网络正能量创作等实践项目，提升专业课程协同育人效果。

第三，实施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工程。一是建立

分层分类培训体系。一方面，全面开展信息技术技能培训，针对数字化教学工具使用、智能化教学软件使用、在线教学设计等开展技能培训，全面提升高校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另一方面，聘请信息技术教学专家成立意识形态教育数字化创新工作室，研究分享AI辅助教学、数据驱动学情分析等前沿方法，选拔骨干教师参与国家级数字思政研修项目，推动形成技术赋能的教师创新团队，整体提升高校教师队伍的数字素养。二是建立激励机制。将数字化教学能力纳入高校教师教学评价体系，设立专项奖励，定期举办教师数字教学创新大赛，激发教师学习运用数字技术教学的动力。三是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高校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云平台，汇聚优质的课件、教学案例等资源，支持教师跨校协同备课和交流经验。

第四，强化“人机协同”的价值引领。一是坚持“合理互动”限度，数字治理在意识形态教育中只能应用于技术环节和辅助定位，核心价值议题不能过度依赖AI设计和算法限定的手段，必须通过主客体之间线下研判和理性研讨等深度交互形式完成，确保价值导向正确无误。二是设定“技术降温”环节，在关键议题教育过程中，学生必须在辅助使用AI工具后提交个人反思报告，以缓冲过度技术依赖导致的情感疏离与思维惰性。三是坚持“价值回归”的复盘导向。人机协同实践的最终指向是实现人的价值回归，应在实践中及时复盘“数字应用—数字治理—数字引领”的全链条过程，通过持续性的价值审视与校准，使数字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的。

### （三）强化制度保障，增强高校意识形态领导力

数智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风险挑战愈发多元，必须以系统化、规范化的制度建设为抓手，通过构建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来厘清责任边界，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常态化提供坚实保障，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稳定与正确导向。

第一，完善数字空间法律法规，依法依规、灵活有序管网、治网。根据国家网络建设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管理细则，明确新媒体账号审批、网络群组监管、在线教育平台内容审核等具体制度，不断推动互联网核心技术创新突

破, 努力提升管网、治网水平, 防范和化解技术短板引发的意识形态风险, 有效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sup>[16]</sup>。提升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预警能力, 建立“技术+人工”的双重审查机制, 运用AI技术拦截非法信息与人工干预相结合, 确保及早发现和及时干预意识形态风险突发状况。

第二, 推动多方联动育人机制建设, 形成全方位育人格局。一是完善组织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一方面, 高校内部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统筹协调、各学院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 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院系年度考核重要项目。另一方面, 高校积极与网信办、文旅局、主流媒体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研判网络舆情, 形成线上线下同频、校内校外共振的育人机制。二是深化产教融合育人, 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风险防控等领域与互联网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三是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机制, 聘请党政干部、正能量的网络大V等担任校外督导, 扩大教育主体范围, 通过直播公开课、线上座谈会等形式扩大教育覆盖面, 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大教育格局, 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机制, 增强学生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接受程度和认同度。

第三, 建立党政协同应急机制,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一是明确高校党委在意识形态安全中的主体责任, 成立由党委书记牵头的网络安全应急领导小组, 制定数字舆情与意识形态风险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规范舆情研判、舆论引导、有效管控和责任追究等流程, 确保流程科学合理。二是开展常态化演练评估, 组织开展意识形态应急处置模拟演练, 邀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处置效果评估并纳入台账。三是将意识形态安全纳入高校绩效考核体系, 对教师课堂言论、校园媒体内容、学生网络行为实行分级风险管控, 将“谁主管谁负责”的制度防线筑牢做实。

#### 参考文献:

[1] 郭孟.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呈现的新态势及其应

- 对[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16): 73-75.
- [2] 李荣胜, 胡慧丽.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新范式[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6(4): 89-92.
- [3] 孙一仰, 高岩. 数字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12): 73-75.
- [4] 潘道广.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使命、挑战及对策[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5(5): 178-184.
- [5] 陈丽荣, 李芝莹. 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机理、风险与优化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5(7): 151-159.
- [6] 李治勇, 王建波.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风险新挑战及其应对[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16): 74-76.
- [7] 路坤皓, 郝文斌. 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 样态、诱因与纾解[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4(4): 165-176.
- [8] 韩萌, 杜艳.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价值、风险与实践[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68(2): 109-117.
- [9] 林开蕾.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样态与治理[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157-165, 208.
- [10] 刘迪.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应对策略研究[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4): 146-152.
- [11] 许凝, 朱俊伟, 王逸鸣. 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化解[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3): 78-80.
- [12] 汪寅, 张慧. 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防范策略[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2, 40(12): 108-113.
- [13] 韩桥生, 李浩. 智能推荐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风险及其应对[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5): 86-92.
- [14] 曾俊淇, 李江静. 数字时代传播格局的系统性重构及意识形态风险应对[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2): 99-106.
- [15] 张慧, 汪寅. 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J]. 广西社会科学, 2023(3): 153-160.
- [16] 肖唤元, 刘雨欣.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战略审视及防范化解策略[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3, 8(6): 86-95.

责任编辑: 曾凡盛